

论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产生的时代规定性及其当代启示*

王 祥

【内容提要】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产生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殖民和宗教扩张的时代。此时的宗教为资本殖民扩张服务，开启了现代宗教世俗化的历史进程，资本殖民扩张引发宗教冲突和宗教伦理价值体系震荡重建。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产生的时代规定性是告别旧时代和预示新时代的统一，它承继并超越启蒙思想和“战斗的无神论”的理论成果，在“世界历史”的时代规定中把握宗教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世界历史”视阈下宗教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将对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趋向的批判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正确把握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产生的时代规定性，对于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科学无神论 时代规定性 世界历史

作者简介：王祥（1978-），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1171）。

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既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其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反映。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产生的科学形态的宗教观，它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根源于时代，具有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特殊规定性，这种时代规定性构成了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立论基石，也深刻制约着其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和宗教扩张

在人类思想史上，“世界历史”的思想由来已久，可以说，追求“大同世界”的理想伴随阶级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它体现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开始对“世界历史”进行理性表达的是黑格尔，他从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角度对由地域的和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进行了缜密的考察，极富前瞻性地预见历史发展的趋向是突破民族的和地域的羁绊，民族的“历史”将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在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观念体系中，“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上升为“世界精神”的外在表现，“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结果必然导致一系列民族历史不断更替的发展过程，导致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世界历史”的形成。尽管黑格尔在关于“世界历史”的认识中包含着抽象思辨和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其的确是在辩证地思考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规律，这也为马克思科学形态“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渊源。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

* 本文系教育部2015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生成发展及其价值研究”（15YJC710061）的阶段性成果。

“世界历史”的概念，并从科学实践出发，深刻地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①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不仅是一个科学概念，而且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革命的勃兴，打破了农业时代的地方狭隘性，人类终于突破了空间、制度和文化等障碍，可以随着资本的扩张而到处立足。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由于生产力落后而阻碍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地域限制被逐步打破，“世界历史”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也逐步替代了地域性的个人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世界历史”普遍联系的生动图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殖民扩张在人们面前铺陈开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③“世界历史”所蕴含的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符合人类社会“普遍性”“全面性”“世界性”和“全球性”的一般趋势，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必要前提和生产力基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④当国内资本市场无法带来更多商品生产和销售利润的时候，资本输出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就成为客观现实，社会分工的国际化 and 资本关系的世界化日益加深，因此，“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⑤。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形成；二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标志，资本的不断扩张是“世界历史”的实质。正是资本的无限扩张，驱使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地建立联系，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与此同时，正是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与世界市场为人类的解放提供了物质前提。“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⑥“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进行资本无限增殖和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外在表现。它推动了整个世界追随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等原生型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近现代，同时也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扩张到世界各地，进一步加深了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殖民地和宗主国、被压迫民族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客观上也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人类解放提供了必要条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时代根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62页。

虽然宗教很早就在世界不同文明地区进行传播和扩张,但像在“世界历史”形成中作为资本主义开路先锋和资本扩张的服务工具的情形还是首次,这也开创了宗教世界性传播和扩张的先河。所谓宗教的世界性传播,是指随着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宗教参与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成为宣传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全球扩张的重要工具。

1. 宗教为资本殖民扩张服务,开启了现代宗教世俗化的历史进程

在殖民主义的扩张过程中,宗教往往充当“文化侵略”的工具,通过美化殖民侵略,为资本扩张作辩护,向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宣传顺从主义的意识,起到了坚船利炮不能起到的思想奴役的作用。当然,这种宗教文化渗透也会加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慈善的伪装来进行利益诱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形成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自觉认同或服从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情形,但这绝不会改变宗教扩张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本质,也绝不会真正起到调和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矛盾的作用。相反,当殖民地人民意识到宗教的侵略本质和欺骗性后,首当其冲的反应就是进行大规模的反宗教斗争,将宗教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战争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常常担任翻译、向导,收集和刺探军事情报,甚至亲自指挥作战,参与谈判和订立不平等条约,这也曾激起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的反洋教斗争。

伴随宗教扩张的是现代宗教世俗化历史进程的开启。近代以来,现代宗教世俗化发端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上帝已死”的宣判,预示着传统西方宗教随着科学理性的迅速崛起而衰落的历史命运。中世纪宗教曾经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宗教被神圣化为超越普遍政治原则的精神力量,完全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然而,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宗教对社会的控制出现弱化倾向,影响力在不断削弱,宗教本身也不再专门关注与向往彼岸世界的上帝和天堂,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此岸世界。在资本全球扩张和西方殖民掠夺的过程中,宗教已经完全褪去了原先的所谓神圣光环,倡导所谓善良、慈爱、宽容等西方宗教理论渐渐撕下了它温存的面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资本殖民扩张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总之,现代宗教世俗化是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宗教在资本扩张时代的必然趋势。

2. 资本殖民扩张引发宗教冲突和宗教伦理价值体系震荡重建

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封闭的农耕社会与开放的工业社会之间、殖民地与反殖民化之间产生了深层次的宗教伦理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对抗,这种精神支柱的抗衡也引发了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关注、融合和冲突,由此又反过来导致宗教伦理体系的震荡重建。宗教伦理价值体系的震荡重建既有西方工业革命后传统基督教伦理价值向资产阶级功利价值观念的靠拢与融合,也包括资本全球性扩张引发的非西方文明对基督教伦理价值体系的本土化反思和重建。一方面,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工业化的高歌猛进使“物质文明”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工业化和物质繁荣意味着人类的某种成熟,而人类的成熟减轻了所谓上帝的负担,所以上帝隐退了,宗教伦理价值体系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只能把自己深藏起来,资产阶级时代的价值观念更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此时统治于西方的基督教也完成了自身的嬗变,通过一系列宗教改革,逐步从愚昧落后的农耕状态中解放出来,以新的面貌适应新的工业化时代。于是,西方基督新教的禁欲伦理精神,促使新教徒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即通过尽自己的天职来回应上帝的召唤,通过劳动创造的财富来增加所谓上帝的荣耀。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现代社会赖以建立的社会经济组织、科层制度、法律系统等,都深深植根于这种理性化的宗教伦理价值体系之中。资本的全面统治与宗教伦理价值的消退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的祛魅。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

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① 在一切都工具化、理智化的新世界里，宗教伦理价值被抽象理智彻底驱逐，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和资本殖民扩张打破了原先各民族、各个国家封闭式内生发展的格局，普遍交往随之产生。作为意识形态主要内容的各民族、各国的原生型宗教也逐步走出独占一方、各自为政的“割据”境地，开启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冲突的近代化过程。在同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各种宗教伦理价值观念不断进行交叉和磨合，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逐渐走向世界，它们在更广的时空范围内形成自己的伦理价值体系，成为不同文明的牢固精神支柱，赋予不同文明以基本文化特征和各自发展的主流方向。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资产阶级在用坚船利炮打开亚非拉国家封闭大门的同时，也以先进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对它们产生了示范和带动效应，吸引其追赶西方国家争相进入现代化，这其中不乏对西方制度、文化、机械的模仿和照抄照搬式的植入。然而，由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宗教伦理价值精神存在巨大差异，西方文化的这种深层内核根本无法移植，不可能在非西方国家落地生根并促进其现代化进程。于是，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历了学习模仿的表面繁荣后纷纷陷入窘境，不得不重新回到自身的文化根基中去找寻现代化的路径，这其中就包含了对适合自身现代化要求的宗教伦理价值体系的反思和重建。

二、“世界历史”视阈下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时代规定性

马克思创立科学无神论的时代是一个承上启下、新旧交替的“世界历史”形成时期，正是这个时代伴随着资本殖民扩张，出现了现代宗教的世俗化和宗教伦理价值体系的震荡与重建，同时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确立了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时代规定性，为其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产生的时代规定性是告别旧时代和展望新时代的统一。由于时代表现为历史发展中的时代，那么马克思科学无神论就必然反映出一种由旧时代到新时代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就是向旧时代告别。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②

第一，马克思科学无神论承继并超越启蒙思想和“战斗的无神论”的理论成果，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规定中把握宗教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科学无神论形成的时代规定性不仅是对旧时代的继承，又是同旧时代的决裂，其告别了18世纪启蒙学者的宗教批判，告别了自然神论，告别了百科全书派的无神论，告别了法国“战斗的无神论”，总的来说，就是向旧时代的告别。告别旧时代就是预示新时代，马克思科学无神论形成的时代规定性就在于此。在中世纪封闭特定地域的单个民族“历史”时代，宗教神学占据统治地位，人性、科学、理性处于被严重压抑的状态，文艺复兴唤醒了深藏于信仰中的“人本”传统和个性自由，科学精神开始大放异彩，完成了近代以来第一次人性复归和知性的革命。人们开始以审视的态度、批判的精神看待宗教神灵，特别关注人性、主体自我及个体生存的意义。这是一个初涉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争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新时代。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用人性解释历史的思维方式的复归，尽管存在唯心史观的天生缺陷，但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和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早期的思想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

蒙，同时也为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革命性变革提供了历史前提。这一时期在批判宗教神学的诸多无神论派别中，以启蒙运动的自然神论和百科全书派为标志、以法国“战斗的无神论”最为典型。启蒙学者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神学存在的意义，斥责其为人们愚昧无知的产物，由此开创了一个理性的时代，一个通向资本殖民扩张的无神论时代。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①它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②。

不可否认的是，启蒙思想家和法国“战斗的无神论”以富于激情的批判思维对宗教和教会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并且将宗教批判和政治斗争直接结合在一起，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无神论的理论基石。然而，这场反对宗教神学的革命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彻底性和新的宗教性质。因为它们对于宗教批判的最终成果只是把人格化的上帝赶下了神坛，却把崇拜的实体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原则，在否认“旧上帝”存在的同时，又赋予“理性”这个“新上帝”以神圣地位。这种对宗教欺骗性的揭露和批判具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从理性出发的历史唯心主义不可能真正厘清宗教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反而造就了适应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另一种宗教形式——“理性崇拜”。

马克思始终将宗教放到“世界历史”的时代境遇中，把科学无神论放到唯物史观发现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宗教及人类的历史命运。马克思肯定了启蒙思想家和法国“战斗的无神论”宗教批判的基本思想，同时剔除了其中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的成分，即反对神，抬高人，但又把人降低到机器的水平。同时，马克思对德国特有的反宗教形式进行反思，在保留了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宗教批判的辩证法思想的同时，又剔除了其中的唯心主义主张，排除了“自我意识”等主体精神对科学无神论的干扰，从而为宗教批判走向政治批判、经济批判进而揭示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奠定了科学无神论的基础。

马克思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规定性中科学阐明了现代宗教世俗化的历史动因，由此揭示了宗教的真正本质和发展规律。马克思强调，宗教和宗教感情是历史的产物，现代宗教世俗化的出现是一个既符合社会发展又符合宗教自身发展规律的历史现象。他深刻地指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③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对人类世俗生活的矛盾，即对现实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深刻说明宗教的社会和阶级根源。宗教世俗化使宗教意识越来越向世俗意识靠拢，宗教组织越来越关注世俗生活，宗教的存在也越来越趋近实用和功利。于是，“世界历史”越是进一步发展，现代宗教就越是面临宗教融入世俗之中而最终消亡、抑或世俗社会被宗教（泛）化这一历史命运问题。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要消灭宗教，必须通过革命的实践（无产阶级革命）消除宗教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④

第二，马克思科学无神论深刻回答了“世界历史”视阈下宗教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将对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趋向的批判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曾经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维护者而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受资产阶级诟病的宗教神学随着“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又被资产阶级以隆重礼仪重新请了回来，成为资产阶级巩固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因此，“世界历史”的时代也是宗教逐步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逐步收复领地的回归时代，是宗教在新形势下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时代。把握住“世界历史”这一时代规定性，才能科学说明宗教的历史命运问题。对此，马克思指出：“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问回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①“世界历史”时代的资产阶级与宗教已经结合成新的命运共同体，即宗教随着资本的世界扩张在世界各地充当路人和先锋队，而资产阶级又如当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一样极力维护宗教新的神圣地位。“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响群众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②

“世界历史”时代的宗教扩张除了包含传统宗教的复归和变革之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趋向。在资本全面统治社会生活的时代，商品、资本拜物教甚嚣尘上，对剩余价值的疯狂追求和对货币财富的顶礼膜拜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新宗教，以至于资本主义产生出一个“倒立着的社会”、一个世俗的宗教世界。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产品支配生产者，物支配主体，已实现的劳动支配正在实现的劳动……劳动和劳动条件的相互关系被颠倒了”^④。于是，新的拜物教性质的宗教占据人们的经济生活，“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⑤。资本主义社会在“世界历史”时代已经完全蜕化为一个宗教化的社会，它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宗教，而且日益成为滋生宗教的新的土壤和温床，成为一个空前异化和颠倒的社会。

马克思科学无神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创立的，这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其宗教化趋向的深刻洞察。他运用异化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异化本质，通过“拜物教”层面的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内在特征，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与宗教关系。马克思从对商品内部矛盾和资本主义“拜物教”宗教特征的分析入手，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或其萌芽，进而揭示出这些矛盾的不断发展和“世界历史”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性质，深刻阐述了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急剧变化背后的宗教意义和历史走向，为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当代启示

马克思科学无神论是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科学形态的宗教观，它的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38页。

④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03-304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7页。

生不仅以本国的历史为基础,更是以“世界历史”为背景,体现了与“世界历史”紧密联系的无产阶级打破宗教束缚、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正确把握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产生的时代规定性,对于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从时代本质的高度看,当代资本主义和宗教领域的变化,都不是根本性质的变化,它并没有超出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扩张的本质在于由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所推动的私有财产运动,在于资本的奴役和统治。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今天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世界历史”时代境遇中。对在“世界历史”时代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并科学揭示宗教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马克思科学无神论来说,它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宗教问题时依然具有天然的“在场权”,这是由其时代规定性所决定的。

第二,要辩证地看待现代宗教世俗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影响,在充分利用世俗化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同时,要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文化侵略。“世界历史”时代的宗教世俗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资本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在宗教领域的表现,也是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重要内容。现代宗教世俗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文化融通的客观要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某些西方国家借此进行殖民掠夺和文化侵略的负面效应。今天,我们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总目标下,必须认真研究现代宗教世俗化的发展趋势,研究这种情况给宗教工作带来的新内容和法律问题,加强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文化侵略,坚决捍卫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第三,非西方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自身文化土壤和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努力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核心价值体系。“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充分证明,现代化绝非西方化,机械地模仿和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甚至其宗教伦理价值体系是一种历史和时代的错位,这不仅无助于本国现代化的实现,而且有重新沦为西方文化侵略对象和经济附庸的危险。在本土化与西方化、民族化与国际化、世俗化与现代化的矛盾碰撞中,发展中国家必须坚决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坚定文化自信,以兼容并蓄、自信开放的积极心态努力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时代潮流中去。

第四,新时代要大力推动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加强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创立来源于时代规定性,是“世界历史”时代科学形态的宗教观。在新时代这一历史发展方位中,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用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好宗教工作,加大对于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力度,使全体人民在复杂的宗教现象和宗教问题面前弄清楚什么是宗教,如何正确对待宗教,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宗教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 邓纯东:《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 [2] 李士菊:《科学无神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 [3] 单纯:《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 [4] 龚学增:《宗教问题干部读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
- [5] 《任继愈宗教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编辑:张 桥)